

# 近八十年來從大陸到台灣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爭辯史再檢討（一）

江燦騰

## 壹、前言

本文可作為戰後現代性宗教學術研究典範的薪火相傳最佳例證，<sup>1</sup>就是近八十年來（一九二五—一九九二）

從大陸到台灣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與爭辯史之相關歷程解說。

載譯自日文佛學書刊的近代研究論文。這種情況的大量出現，顯示當代佛教學術現代化的治學潮流，足以衝破任何傳統佛教思維的反智論者或保守論者。

此因戰後台灣佛教學術的發展，基本上是延續戰前日本佛教學術的研究的學風和方法學而來。而這一現代的學術潮流是普遍被接受的，這與戰後受大陸佛教影響佛敎界強烈的「去日本化佛教」趨勢恰好形成一種鮮明的正反比。儘管當時在來台的大陸傳統僧侶中，仍有部份人士對日本學界出現的「大乘非佛說」觀點，極力排斥和辯駁，<sup>2</sup>甚至出現利用中國佛教會的特殊威權對付同屬教內佛教知識僧侶的異議者（如留日僧圓明的被封殺事件即是著名的例子）。<sup>3</sup>但是不論贊成或反對的任何一方，都沒有人反對開始學習日文或大量在刊物上刊

唯一例外，是由新擔任南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胡適博士，所展開的中古時代中國禪宗史的批判性研究，不只其學術論點曾透過新聞報導，廣泛地傳播於台灣社

會，都沒有人反對開始學習日文或大量在刊物上刊

會的各界人士，連一些素來不滿胡適批判論點的台灣佛教僧侶和居士們，也開始藉此互相串連和大量撰文反駁胡適的否定性觀點，其中某些態度激烈者，甚至以譏嘲和辱罵之語，加諸胡適身上或其歷來之作爲。<sup>4</sup>

其後，又由於胡適和日本著名的國際禪者鈴木大拙的禪學辯論，更使反胡適者找到強有力的國際同情者，於是趁此機緣，鈴木大拙的多種禪學著作，也開始被大量翻譯和暢銷於台灣的知識階層之中。因此，胡適和鈴木兩人，都對戰後台灣教界的禪學思想認知，曾發生了幾乎不相上下的衝擊和影響。<sup>5</sup>

所以，我們如今若要了解戰後台灣佛教學術現代化的发展，其主要的觀察線索就是從戰後胡適禪宗史研究的在台灣地區衝擊開始。

不過，有關胡適的禪學研究，日本學者柳田聖山在一九七四年，就曾收集胡適生平關於禪學研究的相關論文、講詞、手稿、書信等，編成相當完整且深具參考價值的《胡適禪學案》，由台灣的正中書局出版。<sup>6</sup>

在同書中，附有柳田本人所撰的一篇重要研究論文〈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將胡適一生的禪學研究歷程、學術影響和國際學界交流等重要事蹟，都作了細密而清楚的分析。<sup>7</sup>這是關於此一研究主題的極

佳作品。可以說，透過《胡適禪學案》一書的資料和介紹的論文，即不難掌握了理解關於胡適禪學研究的詳細情形。

可是，在柳田的資料和論文中，仍遺漏不少相關資料。例如胡適和忽滑谷快天的著作關聯性，以及胡適禪學研究在中國學界和在戰後台灣學界的回應等，柳田都沒有作系統的交代。事實上，根據我的最新研究發現，最初東方禪學被介紹的東方的另一最大原動力，是日本近代著名曹洞宗禪學家忽滑谷快天（一八六七—一九三四），想效法新渡戶稻造的寫法，而改以佛教禪宗的角度來書寫時，雖也能於一九一三年在倫敦Luzac & co出版其英文禪學著作《武士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Samurai），但未能同樣成功或被接受。

但爲何忽滑谷快天要效法新渡戶稻造的寫法呢？此因在此之前，東亞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文化史的國際研究，是以新渡戶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於一八九九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武士道》爲其開端，其書出版後，迅即風行世界各國，且歷久不衰。可是，這和其書是運用基督教化的變相武士道特殊筆法有關，又得力於明治時代皇軍在日俄戰爭的艱難戰爭獲勝之高度國際軍譽有關，所連當時的美國老羅斯福總統，都好奇地大量買來自

讀和送人，一時傳爲美談，並喧騰於國際間。所以，忽滑谷快天要效法的對象，就是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於西方快速大成功的傳播範例，所以其禪學思想是和日本武士的禪修精神鍛練相掛鉤的，故其英文禪學著作，才會以《武士的宗教》命名。事實上，忽滑谷快天的此書，是在鈴木大拙（一八七〇—一九六六）的英文成名作《禪學隨筆》之前，於西洋出版的第一本東方禪學書。

但因其在書中將禪宗開悟體驗的內涵，一再類比於西方當代哲學和基督教神祕主義體驗心境——這是明顯是仿新渡戶稻造先前已運用過的特殊筆法——所以，反而遭到包括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容格在內的嚴厲批評，<sup>8</sup>所以其學術的重要地位，後來即被另一日本禪學家鈴木大拙的相關英文禪學著作所取代。

但是，爲何鈴木大拙的相關英文禪學著作，後來可以成功地取代忽滑谷快天的此書呢？我們可以兩者都涉及有關「開悟」的解釋爲例，來說明爲何有關「開悟」的解釋會成爲鈴木初期英文禪學著作的主要內容？對於這一點，國際學界向來不會注意。可是，這只要排比鈴木大拙的早期著作系譜和忽滑谷快天禪學著作（包括英文禪學著作《武士的宗教》）的內容，就知道兩者的差異，是有無批判意識的差異和英文表達方式的巨大差異。

。因而，當年的鈴木大拙，其實是因其能避開了忽滑谷快天英文禪學著作的類比方式，轉而強調獨特性和非邏輯性的多樣性「開悟」描述，所以才大獲成功。反之，忽滑谷快天是太過於採取先前新渡戶稻造在英文版《武士道》一書大獲成功的類比寫作方式，所以才未開創新局面，反而招來西方學者如榮格之流的嚴厲批評。<sup>9</sup>

爲了彌補此一缺憾，所以之前，我會撰文討論過此一重要的關鍵課題。<sup>10</sup>其後，柳田本人看到我的著述之後，也認同和幾度會在其著作中引用，<sup>11</sup>並實際會對日本曹洞宗的學者產生重估久被忘懷和屢遭學界貶抑的忽滑谷快天之國際禪學者的應有地位。<sup>12</sup>

亦即，是由於我論證胡適在研究出其確會受忽滑谷快天的影響，才對神會的研究有突破。這也就是爲何胡適雖較矢吹慶輝的發現敦煌的新禪學文獻爲晚，卻能發現矢吹慶輝所沒看出的神會問題。其關鍵的轉折點，就是由於胡適從忽滑谷快天最重要的相關新書《禪學思想史》的論述資料線索和問題意識的提供，才能促其因而發現了神會與南北禪宗之爭的問題提示所致。<sup>13</sup>

其後，由於柳田在日本佛教界研究禪宗史的泰斗崇高地位，所以他兩度引述我關於忽滑谷快天對胡適影響的長段談話，又被日本學者山內舜雄在其著的《道元の

近代化》〈第一章道元近代化過程〉中，分別照引。在

同書中，山內舜雄接著又論述說：是該重估忽滑谷快天的應有崇高學術地位，乃至為其過世百年編全集以為紀念的時候了。<sup>14</sup>

此外，由於大陸著名學者葛兆光對我的討論忽滑谷快天與胡適的論點，也有部份質疑，又提到我應重視清末沈增植的《海日樓劄叢》關於楞伽宗、法如碑漢神會的資料。<sup>15</sup>所以，本章擬結合新資料和增補長篇新註，再改以今題發表，以回應葛兆光對我的討論的質疑和疏失，並就教於張雪松博士<sup>16</sup>和其他相關學者<sup>17</sup>的對我的各項重要的商榷之處。

（未完待續）

### 註釋：

1. 舊雋在〈胡適與近代型態禪學史研究的誕生〉一文中提到：「如果我們要追述現代學術史意義上的禪學史研究，則不能不說是胡適開創了這一新的研究典範。」見舊雋，〈中國禪學研究的入門〉（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七一八。
2. 闡正宗，〈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正篇）〉（台北：大千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一四〇—一五一。
3. 闡正宗，〈重讀台灣佛教：戰後台灣佛教（正篇）〉，

頁一四八—一六九。

4. 樂觀法師曾特編輯，《闡胡說集》（緬甸：緬華佛教僧伽會，民國四十九年六月），在其〈引言〉有如下

激烈批胡之語：「查胡適他原本是一個無宗教信仰者，在四十年前，他主張科學救國，與陳獨秀領導五四

運動，打倒『孔家店』，破除迷信，即本此反宗教心理，現刻，他對《虛雲和尚年譜》居然公開提出異議

，若說他沒有破壞佛教作用，其誰信歟？分明是假借

「考據」之名，來作謗佛、謗法、謗僧勾當，向青年散播反宗教思想毒素，破壞人們的佛教信心，一經揭穿，無所遁形，……（中略）衛護佛教，僧徒有責，我

們這一群旅居緬甸、越南、香港、菲律賓、印度、星洲的僧行僧，對祖國佛教自不能忘情，自從胡適掀起這個動人的風潮之後，全世界中國佛弟子的心靈都受到震動！覺得在當前唯物主義瘋狂之時，玄黃翻覆，群魔共舞的局勢情況之下，胡適來唱這個『反佛』調兒，未免不智，大家都有『親痛仇快』之感！」頁一。

5.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史回顧，有兩篇較完整的論文，可供參考：（一）莊美芳，〈胡適與鈴木論禪學案——從台灣學界的回應談起〉，一九九八年，一月撰，打字未刊稿，共十一頁。（二）邱敏捷，〈胡適與鈴木

大拙》，收錄於鄭志明主編，《兩岸當代禪學論文集》（嘉義：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二〇〇〇年五月），頁一五五一一七八。此外，邱敏捷在另一篇論文中，又提到說：「首先，陳之藩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央副刊上發表〈圖畫式與邏輯式的〉（《中央副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九日，第九版）；翌年底，楊君實也撰文〈胡適與鈴木大拙〉（《新時代》十卷十二期，一九七〇年十二月，頁四十一）。一九七二年元月，英人韓巴壺天對「禪公案」的詮釋。此外，針對鈴木大拙的禪學觀點有所批判，並就「禪公案」提出詮釋觀點的代表人物應首推巴壺天（一九〇五—一九八七）。他與當時之釋印順有所交往，其在「禪公案」的論著對後輩晚學產生不少影響作用。巴氏認為「禪」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苟同鈴木大拙《禪的生活》（Living by Zen）所提「禪是非邏輯的、非理性的、完全超乎人們理解力範圍」的觀點。他指出：「自從日人鈴木大拙將禪宗用英文介紹到歐美以後，原是最冷門的東西，竟成為今日最熱門的學問。不過，禪宗公案是學術界公認為最難懂的語言，參究瑞福（Christmas Humphreys）蒐集鈴木大拙有關禪的七篇文章，編為《Studies in Zen》，由孟

祥森譯，台北志文出版社以《禪學隨筆》列為新潮文庫之一發行問世。鈴木大拙的〈禪—答胡適博士〉，即係書中一篇。從此以後，鈴木大拙的禪學作品，自日文或英文本相繼譯成中文版。半載後，《幼獅月刊》特刊出「鈴木大拙與禪學研究專輯」，除了將上述的楊文載入外，又有邢光祖的〈鈴木大拙與胡適之〉。再過一個月，胡適用英文寫的〈中國的禪—它的歷史和方法〉由徐進夫譯出，刊在《幼獅月刊》總號二三六號。至此，胡適與鈴木大拙兩人所辯難的問題，才漸為國內學者所關注，陸續地出現了回應性的文章。一九七三年朱際鎰〈鈴木大拙答胡適博士文中有關禪非史家所可作客觀的和歷史性的考察之辨釋〉、一九七七年錢穆〈評胡適與鈴木大拙討論禪〉、一九八五年傅偉勳〈胡適、鈴木大拙、與禪宗真髓〉、一九九二年馮耀明〈禪超越語言和邏輯嗎——從分析哲學觀點看鈴木大拙的禪論〉，以及夏國安〈禪可不可說——胡適與鈴木大拙禪學論辯讀後〉等數篇，均是回應胡適與鈴木大拙論辯而發。」見邱敏捷，〈巴壺天對「禪公案」的詮釋〉，《台大佛學研究》第十六期（台北：台灣大學文學院佛學研究中心，民九十七年十二月），頁一一〇—一一一。

6. 對於柳田此書在當代研究的資料使用價值，其不可代替姓，可由大陸新銳學者龔雋的如下的相關比較後，仍肯定之評語看出：「胡適禪學研究的著述，柳田聖山所編之《胡適禪學案》是比較早系統收錄的，但是近年中國大陸在整理出版胡適文集時，發現了更多胡適禪學案》所未曾收錄的有關資料，其中以姜義華主編的《胡適文集·中國佛教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與《胡適全集》第九卷，由樓宇列整理的《哲學·宗教》卷中所收最為詳細，不過，這兩文集所收諸篇亦略有出入，應互為補充。此外，關於胡適禪學英文佛學論文，仍以《胡適禪學案》收集較全，所以最好是將此三種資料結合參證。」見龔雋和陳繼東合著，《中國禪學研究入門》，11003年，頁十四。
7. 柳田聖山，〈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載《胡適禪學案》（台北：中正書局，一九七四），頁五—二十六。
8. 見（瑞士）容格著，楊儒賓譯，《東洋冥想的心理學——從易經到禪》（臺北：商鼎出版社，一九九三），頁一五七—一六四。
9. 見（瑞士）容格著，楊儒賓譯，《東洋冥想的心理學——從易經到禪》（臺北：商鼎出版社，一九九三），

10. 對於此問題，我曾發表〈胡適禪學研究在中國學界的發展與爭辯〉，收在我的《現代中國佛教史新論》（高雄：淨心文教基金會，一九九四）一書。本文就是對此前文的內容所進行的修訂和在資料上的最新大量增補。
11. 柳田本人在晚年完全接受我的看法，特別在他的巨著《禪佛教研究——柳田聖山集第一卷》（東京：法藏館，一九九九），其長篇的〈作者解題〉的頁六七四，

六八〇，兩度引述我的看法，並明白註明是根據我書中的看法。

12. 此因滑谷快天的著作，在敦煌文獻發現後，似乎被大大的貶低其影響力。

13. 對於我過去的此一論述的最新修訂，請參看我在本章以下所提供的新資料證據之補強和相關的最新說明。

14. 山內舜雄，『道元の近代化』（東京：大藏出版社、二〇〇一），頁五十四—五十五。

15. 當代著名學者葛兆光對於我論忽滑谷快天對胡適影響的看法，說他「不盡同意」，可是沒有直接說明原因何在？他又說我「沒有注意到沈增植《海日樓劄叢》關於楞伽宗、法如碑漢神會的資料，是一缺憾。」見氏撰〈序〉，載江燦騰著，《新視野下的台灣佛教近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六），頁二。

16. 見張雪松，〈兩岸佛學研究風格比較：以江燦騰與樓宇烈對胡適禪學研究評述為例〉，《哲學門》

》，總十七輯，第九卷第一期（北京：二〇〇八年九月）。後全文收入《複印資料·宗教》二〇〇九年第四期。<http://www.rendabbbs.com/redirect.php?tid=2349&goto=lastpost>。

17. 台灣學者黃青萍在其博士論文中，曾說我是用「推測

」來推論忽滑谷快天對胡適關於神會研究的最初問題意識和資料線索之提供和相關影響。見黃青萍，〈敦煌北宗文本的價值及其禪法—禪籍的歷史性與文本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頁二十一。

## 臺中市佛教會舉辦浴佛活動

臺中市佛教會暨所屬寺廟團體四月十四日在臺中公園舉辦「佛誕節暨浴佛園遊會」，包括市長盧秀燕、立法委員沈智慧、黃國書、市議員沈祐蓮、陳政顯、民政局長吳世瑋、社會局長李允傑、新聞局長吳皇昇均出席進行浴佛儀式。盧市長表示，各佛教團體不分彼此為信仰努力，對於社會安定及教化人心貢獻良多，照顧弱勢族群更是戮力不懈，她非常感謝。當日活動，除有傳統的浴佛儀式外，也舉辦有園遊會活動，並提供獎品進行摸彩抽獎及名項節目表演，活動熱鬧盛大。

盧市長感謝各佛教團體戮力不懈照顧弱勢族群，例如提供弱勢家庭小朋友的營養午餐、學費或是課後輔導等，身為一位媽媽市長，由衷感謝各佛教團體的付出與奉獻，也感謝各佛教團體積極配合市府各項政策，共同推動，讓臺中市更加美好、祥和。